

# 富人慈善动机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 ——西方文献述评及对中国的意义

杨义凤

**摘要**：慈善动机关系到慈善的行为模式和效率，是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基础。从内在动机来看，在经历了长期的利他与利己争论之后，西方富人慈善更多地被看作是通过个人财富表达对公共事务理解的方式，并由此确立了慈善的多元化发展原则和有效慈善模式的标准；之后学术界的关注点逐渐由内在动机转向外在动机，寻找影响动机的外在因素并建构量化的动机模型，以更好地理解富人慈善的行为方式。受具体社会环境的影响，中西方富人从事慈善活动的动机不尽相同，但西方学者对动机的态度及影响因素的探索仍然有可借鉴之处。比较中西方富人慈善动机的差异，对探寻适合本土社会文化背景的慈善模式和慈善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富人慈善 慈善动机 动机模型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12)12-0084-07

动机，对富人慈善而言，涉及其行为的发端、方向和持续性，甚至是从事慈善事业的具体方法和模式。只有充分理解了富人慈善行为的内外在动机，才能理解由动机所带来的捐赠行为的重大差异，并在制度设计上进一步激发富人从事慈善事业的愿望和潜能。因此，对动机的研究贯穿慈善事业发展的各个时期。

### 一、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的争论

早期关于富人慈善动机的研究与宗教信仰紧密结合，教会是主要的慈善组织，富人的慈善捐赠多通过教会表达。不论何种宗教，都有弃恶扬善、救苦救难的思想内容，基督教、犹太教等在西方广为传播的宗教对富人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重大促进作用。直到今天，仍然有研究认为，宗教信仰是人们行善捐赠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例如，Ostrower

等人对 99 个超级富豪捐赠者的调查发现，“在捐助者乐意认为捐赠是一种责任的因素中，唯一可以确认的是他们属于某个宗教团体”<sup>[1]</sup>；Brooks 认为，美国人比欧洲人更慷慨捐赠是因为美国人比大洋彼岸的先辈们更笃信宗教<sup>[2]</sup>。

利他主义特别是宗教利他的理念，如博爱、原罪等理念在富人慈善动机中占据重要地位，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但是，还有一部分学者尤其是新慈善的研究者认为利他主义或者宗教利他并不是慈善的主要动因，如马修·比索普认为，纯粹利他主义被认为是不能普遍存在和不可持续的<sup>[3]</sup>。马修·比索普等人的立场也可以从早期思想家那里获得论证，例如，霍布斯就认为，宗教所提倡的利他精神不是从现实生活而是从神爱世人的宗教教义中延伸出来的，这种宗教的利他主义不过是盼望个人得教的伪装的利己主义<sup>[4]</sup>。

在利他主义受到严厉批判的同时，利己主义

原则受到慈善家的追捧并逐步获得学术界的认可。钢铁大王卡内基在总结慈善经验时指出,利己主义不但有利于财富的积累和创造,而且有利于散财过程中的效率:“他们有这方面的才能,等到变富以后,他们懂得如何将其用于大型公共事业的发展”<sup>[9]</sup>。卡内基在其《财富的福音》一书中主张只捐助那些值得捐助的人,并宣称“百万富翁将成为穷人财产的受托人”<sup>[10]</sup>。在慈善领域,利己主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投资回报的关注,将慈善看作是一种社会投资,这种投资可以给投资者带来收益,不管是经济收益还是社会地位的提高或者是尊敬、荣誉等声望上的收益。20世纪以后,西方许多国家的遗产税制度不断完善,并且在慈善领域开始实施税收减免政策。这说明政策制定者也开始利用利己主义原则进一步激发慈善捐赠的潜能,利己主义原则在更大范围内得到认可。

但是,作为聚财之道的利己主义并不能解释全部慈善行为,甚至,从一定意义上,慈善的本质与追逐个人利益为目的的利己主义原则是相矛盾的。部分慈善家和研究者认为,如果为了获得更多的个人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捐赠者完全可以投资其他领域,而不必选择慈善领域,在慈善领域的投资未必能够带来经济收益<sup>[7]</sup>。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在利己主义的信条下,许多慈善活动的本质也受到质疑,如家族基金会被认为是变相控制家族财富的手段,过于注重投资回报使慈善偏离公益属性,最终带来“慈善失灵”<sup>[8]</sup>。

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争论持续已久,并不仅限于慈善领域。为了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18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曾提出过“利己的利他主义”原则,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同时又有同情心、与人类成为一体的社会情感、利他人的社会本能。任何人都以追求私利作为行为的出发点,又最终使人以利他和社会的共同福利作为行为的目标,其行为的结果是使个人利益得以实现”<sup>[9]</sup>。在这一提法的基础上,法国社会学家马歇尔·莫斯认为,接收捐助是慈善的另一个要点。在《礼物》一书中,

他写道,所有的捐赠都会创造出某种社会联系,要么是受援者的回报义务,要么是他们失去尊严<sup>[10]</sup>。于是,便延伸出了“回报性利他主义”、“互惠利他主义”等捐赠动机,用来解释富人的慈善捐赠行为。

研究证明,“回报性利他主义”、“互惠利他主义”等动机在慈善事业发展中的确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在与宗教捐赠相区别的世俗捐赠领域。如 List & Lucking 的研究表明,早期得到慈善组织资助的捐赠者的捐赠率会显著提高,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把早期收到的资助作为慈善组织给予的一个礼物,所以在他们变得富有之后,要用较高的捐赠来进行回报<sup>[11]</sup>;Theresa Lloyd 在其对英国百万富翁所做的研究中表示,犹太人的慷慨或许是为感恩心所驱使:犹太捐赠者明确提到希望能回报那些给他们犹太人提供避难所的社会<sup>[12]</sup>。

从利他主义到利己主义,又从利己主义回到利他主义,关于捐赠动机持续不断的争论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慈善捐赠的动机是复杂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捐赠者既不是完全出于利己的目的,也不是完全出于利他的目的,而是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之间的某种组合。如果仅从利他或利己的角度,或许永远无法说清慈善捐赠应坚持的有效原则和方法,无法说清什么才是有效的慈善模式。

为了更好地描绘慈善动机的图谱,也为了跳出利己或利他的争论,后续研究者如 Peter Prumkin 等人突出了“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公共参与”等价值理念的重要性,一方面肯定了慈善领域多元化、自由发展的原则,另一方面为慈善理性立法,既肯定了慈善活动追求效率和影响力的发展模式,又不唯经济理性独尊,在关注效率的同时注重平等参与、赋权等慈善原则,而后者是现代慈善事业迅速崛起的灵魂。

## 二、桥梁的架构:自我价值的实现及公共参与

在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之间,存在一个相对中性的词汇:同情。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以“同

情感”(sympathy)为题开篇。斯密说:“我们时常因为看到他人悲伤而自己也觉得悲伤,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根本不需要举出任何实例予以证明”<sup>[12]</sup>。斯密所说的“同情感”,是指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情感、动机、行为的内心反应能力,其本身是个中性词,并不存在“利己”和“利他”的区分。因此,在同情感的支配下,富人参与慈善活动,更多的是满足情感和心理需求、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

Charles 等人把“自我价值实现”看作是富人慈善的重要动机,他认为,当前慈善热情上涨的部分原因是一些人生意上的成功还不足以让他们快乐。“现在更多的人快速进入了马斯洛所描述的最高级别的需求,为了实现超越自己的目标,他们想让生命更有意义——这在过去通常发生在 60 岁和 70 岁的人中间,但现在则发生在 30 岁和 40 岁的人中间”<sup>[14]</sup>。Paul Schervish 认为,经济和其他资产让富人对自己贡献社会的能力有了更高的预期,许多企业家认为自己是问题的解决者并相信自己能够改善世界<sup>[15]</sup>。正如巴菲特所说,当他把大部分财产捐给盖茨基金会时,他坚信,对方“将最有效地使用这笔钱,比落入联邦公库要强多了”<sup>[16]</sup>。

在商业领域取得成功之后,富人需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发挥影响力以实现自我价值。Peter Prumkin 更进一步认为,自我价值的实现不仅是富人慈善的重要动机,而且这一理念肯定了慈善活动的多元化发展原则,对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作为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慈善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允许捐赠者表达个人价值的过程,它允许捐赠者通过个人财富表达对公共事务的理解”<sup>[17]</sup>。也就是说,以自我价值的实现为导向,富人可以根据个人的价值取向,多元化、自由地选择捐赠领域,捐赠者的动机不应该被看作是自私自利的,也不必过多地给予道德上的拔高,认为慈善就一定是利他的或为了公共利益的。

除此之外,实现自我价值的目标还表达了价值理性的要求,而“效用最大化”假设是唯一理性的行为假设,不论是对工具理性还是对价值理性

而言,都是如此。为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效用最大化,富人在慈善捐赠的过程中注重捐赠的策略和社会影响,并且相信他们有能力带来社会问题的改变。在这期间,慈善事业在社区服务、教育、社会福利、科学研究、医疗卫生及有关可持续发展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如 1936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自主进行黄热病研究首次成功分离出疫苗;1960 年洛克菲勒、福特基金会资助建立改良小麦和大米品种的研究中心,带头进行“绿色革命”<sup>[18]</sup>。

相对于纯粹利他主义,为了达到好的捐赠效果并实现自我价值,新时代的富人慈善不得不关注捐赠的方法和策略,除了捐赠金钱外,在时间、精力、知识和技术上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这种参与原则与利己主义原则下的参与又有着明显不同,学术界的研究主要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

首先,从反思的角度,在利己主义原则指导下,慈善活动最注重的是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回报,捐赠者往往把自身放在慈善活动的中心。例如 Chirstine 指出的,在依托慈善组织开展项目时,基金会太看重对个别项目的资助,而轻视负责运营项目的非营利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最终致使非营利组织功能弱化而无法高效运营<sup>[19]</sup>。

其次,从探索的角度,研究者认为,在追求自我价值实现和公共参与的理念下,一方面,捐赠者借鉴风险投资的方法,在慈善项目执行过程中,帮助非营利组织提高自身的组织能力建设并加强绩效评估,据此,Flieishman 大胆预测,公益风险投资的方法是 21 世纪慈善的主导模式<sup>[20]</sup>;另一方面,在公共参与理念的指导下,捐赠者注重跨界合作,通过建立捐赠圈、与政府合作等方式发挥杠杆作用,以提高慈善活动的效率和影响力。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慈善家开始采用“公益风险投资”和“跨界合作”的方法来从事慈善活动,有学者认为这开启了“新慈善时代”<sup>[21]</sup>。

在慈善新时代,富人不仅注重金钱的捐赠,而且注重知识和技术的捐赠,而那些最能尊重富人

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愿意与富人一起合作致力于提高捐赠影响力的慈善组织往往最有可能吸引到善款<sup>[22]</sup>。与慈善动机和慈善方法的转变相对应的是慈善领域的转变,在新慈善时代,慈善的主要捐助领域逐渐从扶贫济困、赈灾捐助等传统领域扩展到关爱、环保等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密切相关的领域。在这些更具挑战性的新领域,富人慈善采取商业化的发展模式,大量运用风险投资的知识,建立基金会、创办社会企业,努力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方法。

### 三、发展趋势 对动机影响因素的探索

动机是行为的发端,但是,从动机到行为并不总是一一对应的。在此过程中,除人性之外,还受到诸如经济水平、个人特质、家庭社区传统、社会信任水平、公众态度、激励与奖赏等中介变量的影响。从发展趋势上看,西方富人慈善的动机研究在对内在动机做出较成熟的分析之后,其研究兴趣逐渐转向对外在影响因素的分析,并且由质性研究转为量化分析,探索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发掘动机障碍并积极构建动机模型,以更好地解释富人慈善捐赠行为。

英国慈善援助基金会通过一项国际比较研究证明,在影响各国富人慈善捐助水平的诸多因素中,国民财富总值和国家税收水平是影响捐赠水平的最重要因素<sup>[23]</sup>。其中,国民财富总值越高的国家,富人捐赠水平越高。例如在美国,人均年收入约\$40000的捐赠群体中,捐赠额占GDP的比重为1.67%;在英国,人均年收入约\$36500的捐赠群体中,捐赠额占GDP的比重为0.73%;而在土耳其,人均年收入约\$5000美元的捐赠群体中,捐赠额占GDP的比重为0.23%。当然,捐赠比例并不完全与国民财富成正比,税收水平是另一个重要变量。美国2006年的税收总比例为29.1%,而英国则为33.5%,土耳其为42.7%。随着税收比例的提高,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费比率的提高,会减

少社会捐赠的水平。这或许是因为,在缴纳了高额的税收之后,捐赠者倾向于认为政府应该在公益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

Theresa Lloyd认为,家庭捐赠传统和税收优惠措施等因素对富人慈善捐赠水平有重要影响。例如,有家庭捐赠传统的富人更有可能或者更早地加入到慈善家队伍中来;采取税收优惠措施的地区比不采取税收优惠措施的地区更能激发富人捐赠的热情<sup>[24]</sup>。对出于避税动机的捐赠者来说,免税政策无疑是重要的刺激因素。例如Vesterlund研究认为,税收优惠是慈善捐赠的主要刺激因素,但并非所有慈善捐赠都对税收优惠政策敏感<sup>[25]</sup>。Hillel Schmid等人对以色列富人捐赠的研究表明,只有11%的非营利组织在接收捐赠时,具备向纳税人减免税收的资格,而大部分富人在进行捐赠时对他们所能获得的税收优惠并不十分清楚<sup>[26]</sup>。这说明,并不是在所有的捐赠中,税收优惠都能发挥关键作用。

Debra J. Mesch等人分析了种族、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美国印第安纳州富人捐赠的影响指出,年长者、已婚者、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更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收入和较多的社会资本,因此,也更有可能成为大额捐赠者<sup>[27]</sup>。在种族方面,由于慈善捐赠受到人力资本的影响,因而,在对收入、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状况等人力资本的相关变量进行控制之后,研究发现,白人、黑人和拉丁裔美国人之间的种族差异基本消失<sup>[28]</sup>,并且,黑人志愿者愿意花更多的精力为黑人受助者提供服务<sup>[29]</sup>。在性别方面,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富有同情心和利他心,而且,女性在捐款的同时更愿意提供志愿服务,更多地参与到能改变他人不幸境遇的慈善活动中去;相比而言,男性更有兴趣通过捐赠获取他人的承认和社会地位<sup>[30]</sup>。

在社会资本方面,Eleanor Brown通过对美国“社区社会资本基准调查”(The Social Capital Community Benchmark Survey)数据的分析,发现社会捐赠水平受到社会资本的影响<sup>[31]</sup>。如果考虑到个人所

拥有的、基于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和基于规则的社会资本(即社会资本的关系取向和规则取向,此为社会资本研究最常见的两个维度),那么影响社会捐赠的诸因素中,包括 Brooks 所强调的宗教因素和 Mesch 所强调的受教育程度因素,其重要性都会显著下降。这说明,在影响捐赠的因素中,社会资本的作用应受到更多重视。

为了详细说明宗教、受教育程度、基于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基于规则的社会资本四种因素对社会捐赠的影响,Eleanor Brown 进一步将美国的慈善捐赠分为宗教捐赠(religious giving)、世俗捐赠(secular giving)和志愿服务三种类型。在对样本进行二次抽样和 Tobit 回归分析的基础上,他认为,在宗教捐赠中,宗教因素的作用最为重要,那些有着虔诚宗教信仰的捐赠者,年人均捐赠额要比宗教捐赠领域的人均捐赠额高出 \$1550(均值为 \$1544);拥有基于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的捐赠者,无论是在宗教捐赠还是在世俗捐赠中,都有更好的表现,年平均捐赠额度分别比平均值多出 \$429 和 \$746;拥有规则取向的社会资本的捐赠者,在年平均志愿服务的次数上比均值多出 14.2 次(均值为 18.9 次)。这说明,在不同的捐赠领域,社会资本等各影响因素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动机及其影响因素本身的复杂性,一些所谓的最佳模型并不能在具体应用中完美体现。正如 Husted 等人的研究证明,企业或企业家的慈善捐赠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并不是严格按照既定的策略动机、利他动机或利己动机展开,慈善捐赠所带来的财务绩效和社会结果也未必能按照预期的数理模型被精确计算<sup>[32]</sup>。

#### 四、中西方富人慈善动机研究的比较及意义

西方学者对动机的研究为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不仅有助于激发富人慈善捐赠的意愿和潜能、帮助预测慈善捐赠的领域和善款的主要流向,而且还能帮助发掘更有效率的捐赠

方法。而我国学者对慈善动机的研究不够重视,尚未形成体系。

目前,我国学者对动机的研究多从人性和道德的角度来解释,属于传统慈善理论的范畴。例如,毕素华认为企业家慈善行为的动机主要是“义”、“利”与“爱”三个维度,其中,“利”是企业家慈善行为的合理因素,“义”是企业家慈善行为的深层追求,“爱”是企业家慈善行为的情感向度<sup>[33]</sup>。骆建艳的研究则注重传统文化的作用,儒家思想用“仁”来规范个体行为,“为富而仁”是中国人内在于心的价值之源<sup>[34]</sup>。王辉则将慈善捐赠的动机分为利己动机、互惠动机、同情或纯粹利他三类<sup>[35]</sup>。

从人性和道德的角度来解释慈善捐赠动机并无不妥,只是如果过于拔高富人的道德责任则有可能挫伤慈善捐赠的积极性。在实践中,公众对富人慈善动机的不断质疑确实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在这种氛围下,有些学者或捐赠者不屑于对动机进行分析,认为只要是做慈善,无需追问动机:“不管是为了作秀也好,还是为了做广告也罢,结果才是重要的,被捐助者得到实际的关爱才是最终目的”<sup>[36]</sup>。一定意义上说,对动机的回避是为了给富人捐赠一个相对宽容的环境,“富人不捐遭骂,捐了也遭骂”的社会舆论对慈善事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在这方面,如果能借鉴 Peter Prunkin 的观点,把富人捐赠视作“捐赠者通过个人财富表达对公共事务的理解”的一种方式,则不仅能够容忍富人捐赠动机的多样性,而且能够帮助我们客观地认识慈善。允许富人多元化、自由选择捐赠领域是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则。

发掘慈善捐赠中的公共参与意识和公共参与能力,对中国富人慈善捐赠而言是极为重要的。目前中国富人在慈善捐赠中恰恰缺乏公共参与精神,因此他们的捐赠很大一部分是直接给钱,或者是与政府合作,响应政府的捐赠号召。于是,富人的捐赠受到社会热点事件的影响较大,而主动分析情境、持续投资的捐赠不多,很多捐赠带有“社会事件”的性质。例如,抗震救灾中的捐赠井喷,之

后捐赠骤减,捐赠因事件而起,也因事件而止,没有在导致社会不公正的根源性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而后者恰恰是慈善的重要价值所在。

与西方类似,中国学者对富人慈善动机的研究不仅包括对内在动机的分析,对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也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如邓国胜从现实基础和外在环境的角度来考察阻碍中国富人慈善捐赠的因素,认为,从中国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企业仍在进行或刚刚结束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企业家最关心的是如何增加财富而不是如何回馈社会;从外在环境来看,既有慈善组织透明度不高、影响力不够,政府所设立的基金会创办门槛偏高、税收制度不予倾斜,民间慈善力量难以发展壮大<sup>[37]</sup>。陈旭清等人的研究认为,阻碍中国富人慈善事业的主要因素有:传统文化中的“藏富”意识、外在激励机制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滞后等<sup>[38]</sup>。对这些外在制约因素的认识,将有助于突破慈善发展的困境,进一步发掘富人慈善捐赠的热情和潜力,提升富人慈善捐赠的效率。

中国有着悠久的慈善文化,也从来不缺乏慈善意识。但是,从目前富人慈善捐赠的水平来看,特别是与西方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深入了解慈善捐赠的动机和障碍,分析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构建捐赠模型并用于指导实践,这对中国富人慈善事业的制度化、专业化是大有裨益的。此外,慈善文化、慈善动机、慈善模式都是与具体的社会情境相结合的,中国的慈善路径自然会与西方不同,在讲究效率和影响力的慈善新时代,对中西方富人在慈善动机、创新方法、行为策略上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是要探寻一种更适合本土社会文化背景的慈善模式和慈善体制。

注释:

- [1] Ostrower, Francie. *Why the wealthy giv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46.  
[2] Arthur C. Brooks *Who Really Cares: The Sur-*

*prising Truth about 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 Basic Books 2007. pp23-24.

[3][14]马修·比索普著:《慈善资本主义:富人在如何拯救世界》,丁开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6、52页,第43页。

[4]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5][6]安德鲁·卡内基:《财富的福音》,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5年,第75页,第211页。

[7] Minna Halmé & Juha Laurila. Philanthropy, Integration or Innovation? Exploring the Financial and Societal Outcom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No. 84. 2009.

[8] Robe Reich. The Failure of Philanthropy: American Charity Shortchanges the Poor and Public Policy is partly to Blame.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No.4. 2005.

[9]大卫·休谟:《道德原理研究》,周晓亮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第8页。

[10] 莫斯:《礼物》,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页。

[11] List J. A. and Lucking R. D. The Effects of Seed Money and Refunds on Charitable Giving: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a University Capital Campaig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0. 2002. pp. 215-233.

[12] Theresa Lloyd. *Why Rich People Give*. Association of Charitable Foundations 2004.

[13]亚当·斯密著:《道德情操论》,谢宗林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2页。

[15]Paul G Schervish, Major Donor, Major Motives the People and Purposes Behind Major Gifts, *New Directions for Philanthropic Fundraising: Developing Major Gifts* 1997. pp16.

[16] 熊元:《慈善资本主义 2.0》,《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7月31日。

- [17] Peter Prumkin, *Strategic Giving: the Art and Science of Philanthrop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pp 3.
- [18] 资中筠:《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1页。
- [19] Christine W. Letts, William Ryan, and Allen Grossman, *Virtuous Capital: What Foundations Can Learn From Venture Capitalist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No.2. 1997.
- [20] Joel Fleishman, *The Foundation: A Great American Secret: How Private Wealth Is Changing the World*.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7. pp 32.
- [21] Michael Moody, *Building a Culture: The Construction and Evolution of Venture Philanthropy as a New Organizational Field*.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Vol.31, No.2, 2008.
- [22][24] Theresa Lloyd, *Why Rich People Give*. Association of Charitable Foundations, 2004. pp7,pp7.
- [23] Charities Aid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Charitable Giving*. CAF Briefing Paper, 2006.
- [25] Vesterlund, L. Why Do People Give? In W. P. Powell & R. Steinberg (Eds). *The Non-Profit Sector: A Research Handbook (2nd Ed.)*. Boston, MA: Boston College Center on Wealth and Philanthrop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26] Hillel Schmid, Avishag Rudich, *Elite Philanthropy in Israel: Characteristics, Motives and Patterns of Contribution*. *Journal of Welfare and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XV)*, 2009.
- [27] Mesch, D.J., Rooney, P.M., Steinberg, K.S., & Denton, B. The Effects of Race, Gender and Marital Status on Giving and Volunteering in Indiana.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No.35. 2006.
- [28] Rooney, Mesch & Steinberg. *The Effect of Race, Gender, and Survey Methodologies on Giving in the U.S. Economic Letters*, VOL. 86, 2005.
- [29] Morrow- Howell, Lott & Ozawa. The Impact of Race on Volunteer Helping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Elderly. *Social Work*, No.35, 1990.
- [30] Kaplan & Hayes, What We Know About Women as Donor. *New Directions for Philanthropic Fundraising*. No.2, 1993.
- [31] Brown & Ferris, Social Capital and Philanthropy: A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Individual Giving and Volunteering.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No. 36, 2007.
- [32] Husted and Salazar. Taking Friedman Seriously: Maximizing Profits and Social Performanc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Vol. 43, No. 1, 2006.
- [33] 毕素华:《义、利与爱:企业家慈善行为的伦理考察》,《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
- [34] 骆建艳:《企业和企业家慈善行为的动机研究》,《新西部》,2008年第18期。
- [35] 王辉:《从经济人视角看慈善捐赠的动机》,《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11期。
- [36] 徐海平:《慈善别问动机》,《八小时以外》,2010年第5期。
- [37] 邓国胜:《中国富豪捐款为何这么难》,《环球人物》,2006年第10期。
- [38] 陈旭清、曲纵翔:《中国富人慈善事业的现状与对策——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1期。
- 作者简介:杨义凤,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84。
- (责任编辑:羽林)